

历史与现实,如同天地间一道长流之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涌流着,汨汨有声,时而潺潺,时而滔滔,或者莺歌燕舞,或者霹雳雷鸣。在变动不居的前行中,承载着无数的人文信息,记录了多少人生奋斗与磨难的足迹。这应当是宇宙大自然中最生动、最壮丽的景观。

人们从历史景观中一路走来,在前瞻与回望中,流连长途,反思往昔,感慨系之,书之于笔,于是便有了文字的历史,也就有了“历史的文学”。中国小说的诞生,具体时间不可知,据学者考证,当始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马振方:《中国早期小说考辨》,北京大学出版社)。战国时人写周代事,自然是“历史小说”了。通览中国小说史,也可看到,无论魏晋志怪、唐宋传奇,还是明清演义,以所写故事时间而言,“历史小说”是为数不少的,可见其源远流长。

历史小说流传百代,传诵人间,不少巨著佳构,深入人心。如《三国》《水浒》和《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这样的文学经典,过去的时间越长,便越是模糊了“历史”与“现实”的分界线,人们只是觉得,作品中的人与事生动地活在读者心中,而失去了厘清哪是“历史”,哪是“现实”的求索欲望。为何如此?答案也许就在这样一句话中:“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信哉斯言。

如果作为时间概念加以观察,“历史”与“现实”是背向的:历史越追溯越远,现实越向前越近。然而由于现实从历史中孕育而来,总是牵连不断而又变化无穷,留给人们无限的人性思考与社会风云变幻、改天换地的理想追求。故而,历史与现实的足迹印记及其关联,是很值得重视的!

“现实主义”一词,作为一个艺术流派术语,最能体现其特色而被公认的是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现实主义的含义主要是艺术对社会的真实表达,要求作家与作品,把“真诚”视为最宝贵的品质。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如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对待艺术的真诚表达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宽广而正大的。它包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文学品类,包括“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的内涵是朴实的,大众化的。也正因此如此,“人民文学”才更加符合纯正文学的实质,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正统。无论如何强调文学书写“人性”的重要与“向内转”的高明,文学总是与社会分不开的。文学是人生多社会的产物。文学如果离开了社会现实,完全归之于“性灵”之物,那就不是现实主义,也是不符合文学原理的。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赞扬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创造过程争取美好人生的精神,从来就是历史文学的传统。孟姜女的故事为何流传民间,百代不衰?同样是写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为什么《水浒传》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而《荡寇志》却寂然落魄只能藏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供专家去研究批判?所以如此,是由于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历史观造成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时候,不能只去分析它的“艺术色彩”如何,更要去看它的“思想性态”如何。否则,文学评论的偏颇与病态将难以避免。

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学”,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朝代无不将“人民”视为国家之根基,将“人民利益与命运”视为国家命运之所系。故孟子有“民为贵”之说,管子有“天下为百姓”之论。这样的历史观,要求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应当是以人民之心为心,这是证乎古今而不悖的。历史文学本身决定了作家“历史观”的重要性。“历史观”在作品中,是作品思想性的核心。在新中国文学历程的初期,曾经批判过“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写作,而正确的认识是,问题不在于帝王将相是否可以写,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写帝王将相。如果对一个大肆屠杀过人民的封建皇帝加以颂扬,对一个残酷镇压革命起义的刽子手肯定他的“文治武功”,塑造他的大儒形象,这样的历史小说,其思想性都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它背离了时代精神,在颂扬封建道德的华章彩绘中,疏离了人民的感情,也疏离了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

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是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又一突出特征。当一个作家的思想中孕育并充满了“爱心”的时候,他会以真诚之心来关心大自然,关心养育自己的国家,并由此联想到国家命运与人民命运的血肉关联。由这样的情怀产生的忧患意识,是现实主义的宝贵品格。屈原的《离骚》以其悲壮之笔与瑰丽的想象,写了一个士大夫在楚国陷入危机之际,忧国怀乡,上下求索,与王母相遇,向上帝叩门,寻道问路,追求真理。一个与国家共存亡的悲壮灵魂,彰显于被物欲颠倒是非的人间。若把《离骚》当做一部意象瑰奇的小说来看,同样是感天动地而泣鬼神的神。

至于1970年代前后出版的姚雪垠的《李自成》、谷斯范的《新桃花扇》、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星星草》等历史文学作品,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优秀之作。《李自成》以其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体现了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强大生命力。《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以革命坚忍不拔的笔触,塑造了李自成生动鲜明的义军领袖形象,描写了封建末世风雨飘摇的社会图景,以及人民力量与封建势力拼死搏斗的悲壮与思考。如果抛弃偏见,《李自成》在当代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历史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爱国主义的这一思想艺术特点,是我国古代文学(包括“传奇”戏剧、章回小说等)的优秀传统。近世以来,域外文学广泛传入中国,西方小说的写作艺术与写作模式为我们所吸收,并逐渐以此为主流,形成“新文学”。这种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学艺术的交流融通是十分正常的、有益的。所谓“新”与“旧”,只是由于时间与地域因素产生的一种不同感觉,而文学的实质——反映社会人生的艺术功能是不会改变的。饶宗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赵氏孤儿》”一剧之西传,于欧陆震撼尤大。若《风月锦囊》杂剧一类书,久已由传教士携至西班牙,汉土小说竟获歌德、席勒之青眼……”(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篇·饶宗颐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的古代小说能受到西方文学大师歌德、席勒的尊崇,而我们自己有什么道理将文化传统一笔勾销,“刷新”了事呢?

文学是社会的风雨表,是人类良知的真诚表达。只要文学将历史与现实的土壤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的生命力便会同江山永在,万古长青!



诗歌的现实精神 主导性与多元的考量

□峭岩

了规模的文化、心灵碎片的产生,这些碎片总的来说,因为过于“个人化”而显得缺少共鸣,不能成为别人的营养,而只能成为消极的心灵废墟式的产品。

在诗歌写作里,我所说的“个人化”或“个体化”,它与“个性化”有本质的区别。姑妄言之,个性化是在共性领域有共性参照的情况下,追求个性的发展与完善。它与共性有着随时随地的对话与彼此修正。而个人化或个体化,是完全脱离集体,在抛弃参照体,失去任何公共性衡量与比照、监督、对话的情况下,所发展的一种无益于社会整体发展的自私化、自恋化精神。这种写作者,不管国家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只管埋头写琐碎的生活,专注蚂蚁不写鹰了、专注露水不写星辰月色了,丧失了对整体事务的把握。新时代精神喊了数年,碎片化现象依然“一地鸡毛”,不扭转,是我辈之无能。

有人还把“肉体”写作当作个性。我认为它根本上是与诗歌本质剥离的一种写作,是摆脱了诗歌主旨的写作。淫诗的放开,极大地损害了诗歌的尊严。有的诗人弃诗人桂冠于不顾,大张旗鼓地写性,还扯旗立派,企图留名青史,是极大的反动。淫诗为什么不能算诗?因为诗之正统,即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须知在两千多年前,采自民间的《诗经》,也是有门槛、有规格、有审美标准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诗经》作品没有经过文官秀才的反复甄别遴选,那么它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经典呢?

诗人自身建设迫在眉睫,网络的出现,降低了诗的门槛。诗是诗,不是口水,诗学是一门专门的学术研究,自有它的体式、语言、韵律的规范,自有它的高深之处,来不得一点虚假。诗人的自身建设包括修身、自醒、谦卑、进学,还包括要懂得拒绝将一些网络上消极的起哄与围观当成是诗歌质量的保证。要建立起正确的诗观,而建立正确的诗观的前提,即建立正确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之外,还要加上正确的文学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诗,这些问题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我们思考和面对。

问题还得回到主题上来。习近平总书记讲: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不能没有灵魂。又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诗人要领跑一个时代,为人民群众立言。为此,我们要认识到今天的时代,是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

同的伟大新时代。为什么是伟大的呢?因为它不再犹豫,不再彷徨,不再因为外来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制裁的影响而产生一种根基性的动摇。

我想,新时代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旗帜、道路的再确认;2、马克思主义的重申;3、中国方案、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4、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确立;5、以英雄模范为主导的意识确立;6、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确立;7、科技强国、科技强军、科技为民的主体思想的确立,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新时代的丰厚内涵,并且坚定了我们的步伐。这就是作家、诗人立足的根基和要奔赴的方向。

换言之,在这个主导线上,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多元性,为我们如何在多样化的发展中不至于迷失方向而确立了方向标。我们关于多元化写作的考量依据,也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强调主导,并不排斥多元性,这是全局下的布局考量。应该承认,这个时代为艺术家、诗人们提供了广阔而宏大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是上天赐予的答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回答,每个人类个体都要受到检测和制约,从而规范我们的言行。可以说,正是这种现实在场,构成了我们的神往之地,我们没有理由迷茫,消极,我们更没有理由畏缩不前。

在考虑到这个主导性的思想之后,我们依然要提醒作家诗人需有独立的写作者人格与思想格局。总而言之,在公与私,个人与公共之间,我们随时都须遵循两个命题,也可以说是真命题:即诗人的独立思考,对于为什么写作,写什么,怎么写的确认,始终是作品的成败决定因素;诗人的全局意识是我们能不能写出大诗,能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史诗之关键。



山里的小伙伴

□张茹薇

“六一”节去山区学校公益活动
我有了一个山里的小伙伴
她和我一样读小学二年级
总是笑眯眯的她长得比我还高

我的班上47位同学
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她的班里只有8位同学
桌椅板凳在教室里有孤单单

我的课桌里放的是
《爱丽丝漫游仙境》
她课桌上放的是
《黄冈小状元》和《数学同步》
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聊着开心事
八卦了跑男里的明星
我告诉她我朗诵比赛得了好名次
她说她昨天还给外地打工的妈妈通了视频

中午去她的食堂打饭吃
看见食堂前一天的菜谱是
炒土豆丝、炒花菜、回锅肉、黄豆芽汤
和我们食堂的菜谱也差不多

临别时我说我明年“六一”再来看你
她却说明年也许已经不在这里
每学期班上都有同学转到爸妈打工的南方去
唉,我们没有说再见只默默把电话号码记

昨天接到她用奶奶手机给我的电话
兴奋地告诉我她爸妈春节就要回来了
最开心的是爸妈不用再外出打工
因为村里新办的工厂已经提前把他们招聘

山里的小伙伴,真替你高兴
明年“六一”节我还要和你比拼一个亲子游戏



何谓诗歌的现实精神?它的本相是什么?它的动力源在哪里?诗歌或者文学如何审视现实主义,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实际上并没有终极答案。

毋庸置疑,现实指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一切事物,大到时代的风云际会、社会的热点问题,小到日常生活的苦乐悲欢、柴米油盐。比如,全世界正经历的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正在发生的南方抗击洪水的事件,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态度的迥异、制度的比拼、价值观的呈现、美与丑的较量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每天都在上演,投影在心灵里,诉诸我们的笔端。众所周知,这可形成两种现实:一种是客观描述的事实,一种是主观心理事实。这里我们要提问的是,材料的真实性怎样变成真实的诗意?对诗人来说,这须面临一种修辞与事实之间的协调。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现实生活是有品质导向的。最早的品质定位是真、善、美,即最能体现向上的、青春的、美好的那些品质。我们的作品如果保持这些追求,那么可以说这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通过广大读者的追求共鸣来印证实现。不过,真善美同样是有不同的评价尺度的,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个人说了不算,一群人说了也不算。只有当言说与实践相结合,并从中加以论证时,这些真善美的概念才有可能成为可靠的。同理,当现实走进文学时,它变成文学的现实主义,凡持现实主义之文学作品,我们都可将之信赖为人生的一面镜子,乃至真理的反应。但是什么才算真正的、文学的现实主义呢?这需要我们自身经验的鉴别。

正如在疫情面前我们所表现出的种种举动一样,一方面是逆行赴战、主动请缨,另一面是旁观讽刺,闭目造车。显然都是真实的,但用诗歌的终极使命来衡量,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其中有的真实性就有了问题。我们很多作家诗人在义愤填膺地抨击社会不公时,所诉诸笔下的文字是否完全真实呢?如果一个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现存社会,他所说的我们要不要赞同呢?桃花源与乌托邦社会模型,在一种笔触方式里向我们明确地说明了它是虚构的,而不是真实的。那么,现实主义文学文本,首要的一件事显然是区别于桃花源式的叙述,区别于一般乌托邦叙述的叙述。这种区别我想是容易的。那么,第二种区别方式是什么呢?当一位诗人描述人性的扭曲时,我们将依据什么来判断它的真实性呢?如果他描写的有失真实,那么会不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呢?这个柏拉图式的担忧,虽然比较落伍,却是可能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与文学问题。我们的诗人如若不致力于社会之光明发展、科学发展,那么,我想我们的写作也是没什么意义的。

必须说,真实不仅是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也是人性本身向善的一个方面的体现。人们总是讨厌撒谎者,因此,现实主义也是最简单最本质的人性反映。它的动力源自对于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心理诉求。诗人总是站在现实与梦想之间,以语言的艺术搭建彼此间的桥梁,摆渡苦乐人生,期待或引导人们走向更美好的彼岸。

这里还须强调主导性。主导性,也就是带有导向意义的艺术形态,发挥引领、导向作用的人性。在庞大的文学群体里正是那些闪烁着璀璨文化光芒、人性光芒的作品,支撑着灿烂的星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德引领”“培根铸魂”是见主导性的重要。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魂”,一个军队不能没有“军魂”,一个时代也不能没有“时代之魂”。这个“魂”必然是正义的、刚毅的、宏阔的,又是充满理想的存在。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强调多元的时候,又过多强调了“个人化”,忽视了“公共性”。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反对“个性化”的写作因素,而是反对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形式。因为它导致

(上接第1版)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人类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世界上所有人和事,都是地球上发生的人和事。所以《爱的礼物》一书的人物和故事都置身于人类的大背景之下,都是地球棋盘上不可或缺的棋子和细部。与我前不久完成的《景观生态——守望蓝天词语》一书,是同样的谋篇立意,只不过从保卫人类、保卫蓝天走向了保卫大地、致富中国的贫困人口。传统观念是农民种地离不开土地,而现实的表达则是农民种地意味着贫穷。千方百计离开土地的方法,过去是科举取仕,现在是考大学,从工、从商、从政,大家共识很明确,从土地的束缚和贫穷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改变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脱贫攻坚则升华和更新了这个含义,不仅是让农民脱贫,从土地无所不在的束缚中把农民解放出来,同时,也把25度坡以上的土地从无度的垦殖中解放出来,退耕还林,让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赋予土地以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营方式,走良性的现代化绿色种植的道路,消灭贫困超越了政治范畴,归入了实实在在的人类文明范畴。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也是史无前例的一种伟大尝试。地球能养活的人口有限,饥饿还在世界上肆虐。中国政府锐意脱贫攻坚、消灭贫穷、全民奔小康,绝非一国一地对贫穷和饥饿的改变和努力,占地球人口七分之一的中国的饥饿是可怕的,如果中国不能温饱有余,14亿人口向全世界进发去寻找觅食,那就是世界的没顶之灾。祈祷中国的脱贫攻坚奔小康成功,应该是世界人类的共识。中国人安定了,世界就安定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奔小康不仅是送给本国贫困人口和地球生态的一个爱的礼物,也是送给全世界全人类的一个和平稳定的爱的礼物。这仅仅是个开始,全世界全人类今后都应该为之努力。

记者:《爱的礼物》这部作品,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是“真实”。从领导层到扶贫干部,再到每一位群众,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您怎样理解报告文学作品中“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哲夫:我以为,纪实文学必须具有三个要素:真实性、新闻性、文学性。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人物和故事必须真实,而且具有相当的新闻性,比如我在书中所写的每一个人,我都尽可能真实,并从中抽取最鲜活、最有趣、最生动的片断,进行文学性的描述,如果没有这些鲜活的东西,也就失去了意义。文学的各种手段都可以使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反复咏叹,反复啰嗦,甚至词不达意,不要过多雕琢和粉饰,尊重主人公的个性,尊重现场人的感受。文学只是一个工具,不可以哗众取宠,不可

以喧宾夺主,不可以脱离真实拔高人物。

记者:当下,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胜阶段,经过了这段时间的采访创作,您对脱贫攻坚有了什么更深的认识?您认为作家和文学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怎么样的担当?

哲夫: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认识再认识、学习再学习的过程。在我没有全面观察到大象时,也曾片面地认为所谓“大象”无非是一把摇来摇去的肉蒲扇。但只要是你认为正确的事,就要勇敢地大声说出来,不要怕被人说三道四。

一位扶贫工作队长告诉我:“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管你遇上什么事,去求人帮忙,只要你说是扶贫,几乎没有单位和个人说不能的,都会尽量帮你。王平这个人也是,是刘所长托人,人又托人,才找上的。你说找他的人一天有多少?一开始根本不睬,后来听说说是扶贫的,马上就热情了,不仅热情了,还优惠我们,你是没看见,我们送高粱时,拉高粱的车队也是特别免费的。我们运管所驻村工作队的人亲自押车,坐在车上,睡在车上,走到哪里都是一路绿灯,收费站都不收我们的费,大车不让走的地方警察给我们开道。到了地方,王平还亲自请我们吃了饭,把我们感动的!人说了,感动啥?你们也不是为自己!这话说得让人寻思,的确,都不是为自己,难道是为国家吗?真就有这么高的觉悟?国家让干事是完成任务,但这件事可不是光是为了国家,为自己天地良心,为穷人做好事,不光是为国家,也为自己,求个心安!”

毫不夸张地说,脱贫攻坚已经不是国家的事,变成了全民的事。

我在抖音看到一个短视频,直播一个贫困老农,老农七十四斤核桃,女主播非要按八十斤核桃付钱,争执不下,而且女子还要继续往上加价,老农流泪了,女子也流泪了,我转发这个视频时加了一句话:中国脱贫攻坚史无前例,希望继续下去,深入人心。5月28日6点零6分发出,不到半天功夫阅读量达22.9万人次,90%以上是感动和赞许。我作了一个小结:千百年来,摆脱贫困共同富裕是人类的心愿。说三道四者,铁石心肠,只是故作姿态,影响和触动无处不在。这是中国人和世界人心中最柔软最敏感的区域。能不能做到是其次,做与不做却是试金石,结论:在中国,扶贫已经深入人心。

贫困的真实存在使脱贫攻坚具有了对人类而言的重要意义,这是生态人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走向社会人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一步,人类命运共同体呼之欲出。成功的前提保障是一句大家都知道的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在人类社会,理想主义永远都不会过时。